

# 非洲国家民族建构的理论与实践研究

——兼论乌贾马运动对坦桑尼亚民族建构的作用

李安山

**【内容提要】** 非洲国家的民族建构经历了十分复杂甚至痛苦的过程。正是这种痛苦的经历使非洲人民逐渐认识到,民族冲突不仅影响到国家的发展与人民的生活,也是对既定社会秩序和民主政治的威胁。国家强盛需要统一的民族,民族建构因此成为很多非洲国家的重要任务。在民族建构的过程中,众多非洲政治领袖选择社会主义作为官方意识形态,对促进民族一体化起了重要作用。乌贾马运动对坦桑尼亚民族建构的贡献更是功不可没。

**【关键词】** 非洲 民族建构 社会主义 乌贾马运动

**【作者简介】** 李安山,1953年生,北京大学教授。近作:《试析非洲地方民族主义的演变》(《世界经济与政治》2001年第5期)。通信地址:北京大学非洲研究中心;邮编:100871。

地方民族主义 对一些非洲国家构成了极大的危害,成为非洲政治中的一个毒瘤,然而,在另一些非洲国家却不存在这种政治疾病。这是为什么呢?本文拟从非洲民族建构的理论入手,对意识形态(主要是非洲社会主义)的作用进行分析,并以坦桑尼亚的乌贾马运动为例,探讨这场运动对于国家民族建构过程所起的作用。

民族建构更强调主观因素的作用;其二,民族建构表示的是一个过程,而民族一体化既可表示一个过程,也可表示一种结果。

非洲的独立国家是多种因素互动的产物。它既有非洲传统政治的成份,也包含着殖民主义的遗产;它既是非洲人民长期斗争的成就,又是殖民宗主国政策演变的结果。正是由于各种因素的相互作用,独立后的非洲国家的民族建构经历了十分复杂甚至痛苦的过程。正是这种痛苦的经历使非洲人民逐渐认识到,民族冲突不仅影响到国家的发展与人民的生活,也是对既定社会秩序和民主政治的威胁。国家强盛需要统一的民族,民族建构成了很多非洲国家的重要任务。

所谓国家民族建构(nation - building),是指一个国家承认存在多个民族和不同文化的事实,致力于建设统一的现代民族的过程,它包括政治经济的一体化以及民族文化的一体化、民族性格的培养、民族心理的孕育等方面。民族建构与民族一体化意思大致相同,但有两点不同之处:其一,

“地方民族主义是指在一个国家范围内占据(或曾经占据过)某一特定地理疆域的族体为维护 and 促进本族体的自身利益和提高本族体在权力中心的地位而表达出来的一种心理情感、思想意识和实践活动。”参见李安山:《试析非洲地方民族主义的演变》,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1年第5期,第44页。

当代非洲的四位著名学者基—泽博、马兹鲁伊、翁吉和博亨在他们撰写的关于非洲民族建构的章节中认为,在民族建构的过程中,生活于一个国家的不同文化和族体在处理相互关系时可经历六个层次或阶段:共处(co-existence)、接触(contact)、竞争(competition)、征服(conquest)、妥协(compromise)、聚合(coalescence)。由于在英文中这6个单词均以“C”字母开头,我们权且将这种理论称为“6C理论”。这种理论多少受到由美国学者罗伯特·帕克于1921年提出的“种族关系循环论”的影响。然而,非洲学者却在非洲历史与现实的基础上加上了自己的理论成份。可以说,6C理论是对非洲一个国家内各种文化和不同地方民族关系的最好概括。下面大致介绍一下6C理论,并提出作者的看法。

第一个也是最基本的层次是共处。这种关系的主要特征是一个国家存在两个或两个以上互不了解的族体,各方都力图保持自己的传统价值观。第二个层次是接触。不同文化或民族的接触包含各种内容,从物质生活到精神生活。族际关系的第三个层次为竞争。对资源、权力或机会的竞争不可避免,其表现形式可以是公开的,也可以是隐晦的。这种竞争以政治形式表现出来往往是意识形态的争论。征服是第四个层次。在激烈的竞争中,某一民族或文化在竞争中占据优势时即会出现这种情况。各种特权、腐败现象或政治专制会随之出现。达到新的平衡途径是妥协,这是第五个层次。不同的意识形态、政治理念、文化传统在斗争中逐渐发现一种双方(或多方)均可接受的形式,族际关系乃至各种社会伙伴关系达到一种新的平衡。第六个层次是聚合。文化与民族的融合不仅是一种理想的结果,也是一个不断进行的过程。经过妥协达到的平衡使各种文化和不同民族有机会重新审视对方,从而产生一种新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那种扩大的认同感可能将成为民族意识。族体性与民族意识融为一体。一种民族意识形态可能正在形成。”当然,这是一种最为理想的结果。

对于这种理论,有几点需要补充。第一,在共处的环境下,这种互不了解有多种原因,或是一种刚抵达的迁移者与当地定居者的关系,或是受地理条件的各种限制而缺乏接触,或是由于历史上

的交恶而长期保持敌对关系所致。需要说明的是,在今天的非洲国家,这种情况只能说是特例(如个别生活在热带森林中的民族)。各个民族与其他文化或民族进行接触及了解他人多持保守态度。第二,在接触的过程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是相互交流和相互了解。不同民族或文化在接触过程中必然导致交流,这种交流将促进相互了解。在有的情况下,这种交流将促进一体化,即双方的相互接受和融合;在有的情况下,这是一个取长补短或相互补充的过程。概而言之,民族的交流可以引发诸多良性互动。第三,竞争的一个根本原因在于:一个国家内的不同民族在自然资源与经济资源的再分配过程中是不可能完全平等的,这种再分配与政治权力有密切的关系。虽然从理论上说,独立为各个民族进入社会各领域提供了机会平等的可能性,但由于殖民政策(如“分而治之”与“间接统治”制度)遗留的问题,各民族的机会在实际上并不平等。这样,值得注意的有两点:一是这种竞争往往带有过渡性,很快就会得出结果,而且由于有各种新机会和新因素,这也将是一种持续不断的过程;二是如果仅从民族或文化的角度来解释这种不同意识形态的竞争而忽略不同阶级或政治集团的需要,这种解释有简单化的倾向。第四,当某一个地方民族在整体上占据优势时,其成员的机会远比处于劣势的民族更多。居于优势的民族在竞争甚至政治斗争中可能占据统治地位,这种征服在一些国家导致了恶性循环,使原有的竞争机制(尽管不平等)和多元化逐渐消失。同时,在所谓的征服过程中,我们不应忽略同一个民族集团中各成员由于社会地位和财富的不平等也同样存在着机会上的不平等。第五,征服的后果往往是引起反抗,因而征服的状态不可能持久。被征服的结果意味着失去权力,失去权力意味着失去资源和机会,处于劣势地位的民族往往以各种方式进行反抗,以保持或夺回失去的权力,甚至不惜以分离为代价。在一个相对稳定的

“种族关系循环论”(race relations cycle theory)是一种种族同化理论,这种理论认为种族间的同化过程如下:接触(contact) 竞争(competition) 冲突(conflict) 适应(accommodation) 同化(assimilation)。See Robert E. Park, *Race and Culture*, New York, 1950.

Ali A. Mazrui (ed.), *General History of African History VIII: Africa since 1935*, Heinemann, 1993, p. 497.

国度里,因民族冲突而引发的任何形式的反抗和斗争均是一种两败俱伤的结局。

6C 理论之所以重要,在于它揭示了非洲民族建构过程的必然阶段。我们必须看到,在民族建构的过程中,地方民族主义与民族主义是可以互相转化的。尼日利亚的比夫拉战争是一个很好的例证。伊格博人感到自己在政治权力和自然资源的分配上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在东区长官奥朱古的率领下于 1966 年要求分离。经过一场两败俱伤的內战,比夫拉共和国战败,国家重新统一。尼日利亚著名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索因卡在內战爆发后一个月发表的题为《让我们想想这次战争的后果》的文章中一方面谴责奥朱古的分离行动是一种失算,同时也要求联邦政府拿出一种对未来负责的态度。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在目前的冲突中无人可以获胜,只有人力物力的不断浪费和一种表面的控制权,这种控制迟早必将在我们面前爆炸,将国家炸得粉碎。”这是多么深刻的见解。

虽然这是一次由军队首脑领导的分离事件,但我们仍可以看到东区伊格博人认同感的两次转变:从认同于尼日利亚人转变为认同于伊格博人;又从认同于伊格博人转变到认同于尼日利亚人。换言之,当伊格博人认为作为尼日利亚人所得到的利益小于作为伊格博人的利益时,或伊格博人从整体上感到在尼日利亚联邦中所受不公正待遇已到了不可容忍的地步,他可能愿意作为伊格博人而放弃作为尼日利亚人。如果从思想上分析这种认同,这是从民族主义向地方民族主义的转变。比夫拉事件最重要的意义在于伊格博人重新接受尼日利亚人的身份,重新认定尼日利亚作为自己所属国家的合法性的认可。

概而言之,国家民族建构与地方民族主义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国家政权的强大和民族政策的适当。国家的宪法往往规定人民的福利是政府的首要目的。如尼日利亚 1976 年宪法草案的第 8 条明确规定:“人民的福利应为政府的首要目的;政府必须对人民履行义务并承担责任。”如果国家政权弱小,它就不能为公民提供基本的生活保证和福利条件,有时公民的生存也受到威胁。在这种情况下,公民只能寻找其他的保护者,从而为地方民族主义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条件。

反之,强大的国家在政治经济上为各个民族的发展提供所需的环境和资源,为不同文化的交流创造了条件。这样,势必促进现代民族的形成过程。

## 二

在民族建构的过程中,各种因素均起着不同程度的作用,如文化政策、语言、宗教、法律保证、权力分配等。本文仅探讨意识形态的作用。不言而喻,在绝大多数国家,总统的权力在民族建构中具有决定性的作用。独立后的第一代非洲领导人多为具有崇高威望的民族主义领袖。他们在民族独立运动中以所属殖民地的全体人民的利益为重,与殖民统治者进行了抗争。在这种意义上,他们可以声称代表着国家—民族的利益。

我们注意到,独立后相当多的非洲政治领袖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有的国家还以法律的形式将各种非洲社会主义的理论确定为政府的官方意识形态,以此来统一民众的思想,推动独立后的政治经济建设,促进民族的一体化。在这一方面比较突出的有纳赛尔的社会主义,尼雷尔的“乌贾马社会主义”,卡翁达的“人道主义的社会主义”,桑戈尔的“民主社会主义”,塞古·杜尔的“能动的社会主义”,恩克鲁玛的“实证社会主义”,凯塔“现实社会主义”,布尔吉巴的“宪政社会主义”,以及莫桑比克、安哥拉和埃塞俄比亚等国奉行的“科学社会主义”等等。

民族主义可以说是非洲社会主义的显著特点之一,这是国内外学者将其称为“民族社会主义”、“民族的社会主义”或“民族性社会主义”的主要原因。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是与非洲当时的社会发展和政治现实同步的。这种政治现实的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长期以来,推翻殖民统

Wole Soyinka, "Let us Think of the Aftermath of this War", *Daily Sketch*, August 1967; Ruth First, *The Barrel of a Gun*, Penguin Books, 1970, p. 351.

Colin Legum, *Africa Contemporary Record: Annual Survey and Documents, 1976 - 1977*, New York, 1977, p. 66.

国内研究非洲社会主义的著作主要有:唐大盾、张士智等著:《非洲社会主义:历史·理论·实践》,世界知识出版社 1988 年;唐大盾、徐济明、陈公元主编:《非洲社会主义新论》,教育科学出版社 1994 年。

治争取民族独立一直是非洲国家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的主要目标；(2)在民族独立运动中，各派政治力量围绕上述目标结成长期同盟；(3)非洲工人阶级或民族资产阶级还未强大到足以成为人民大众的领导力量；(4)民族独立运动的领导权一般掌握在一批代表全民族利益的民族知识分子手中。非洲社会主义的提出，一方面反映了非洲人民向往平等生活、追求理想社会的迫切愿望，另一方面则表现出他们希望有自己的理论体系，希望有一种反映非洲社会特点表达自身价值观点的思想意识。非洲社会主义的民族主义特征主要表现在强调本民族的传统价值体系，强调自己独特的“中间道路”或“第三种理论”，强调对外的民族解放斗争而忽略内部的阶级分化和阶级冲突。

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在世界性的‘私有化’和‘民主化’浪潮的冲击下，在世界社会主义开始走向低潮的情况下，非洲社会主义普遍遇到挫折和失利，尤其是一些自称科学社会主义的非洲国家全面陷入了危机。”然而，作为独立后一种具有自身特点的意识形态，非洲社会主义在民族建构过程中的作用是不容否认的，它至少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首先，这种意识形态可以说同时满足了领导者和被领导者双方的精神需要。新兴的非洲国家不是一个虚体，它是由领导者和被领导者构成的。随着民族独立这一目标的实现，民族主义已失去了昔日的神圣光环，非洲社会主义应运而生。它既反映了政治领袖力图用一种具有非洲特点的意识形态来加速民族建构、整合民族精神的愿望，也迎合了人民大众的普遍要求，因为民族认同是独立后的非洲国家每一个公民所面临的问题。由其领袖创立的思想（如尼雷尔主义、恩克鲁玛主义等）无疑为他们提供了一种可以依赖的精神支柱。

其次，非洲社会主义为这些国家提供了一种易于理解和便于操作的思想理论基础。独立后的许多非洲国家面临着实际问题，既无代表先进生产力的阶级力量，又无民主政治的经历与经验。民族主义理论的感召力不复存在。新领导人可以利用的就是意识形态的统一和政治权力的集中。在这方面，强调一党制、国有化和中央集权的非洲社会主义提供了最佳选择。无怪乎有24个非洲国家选择了社会主义。对于新领导人而言，这

种意识形态成为对全体国民的一种新的感召力，对政治秩序的稳定和国有化经济的建立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保障。可以说，非洲社会主义提供了进行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一体化的一面旗帜。

再次，非洲社会主义为新兴国家的中央政权对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各个层面进行干预提供了一种制度保证。在殖民统治时期，行政管理从来就是自上而下。值得注意的是，殖民政权的政治体制不仅与传统非洲政治毫无共同之处，与典型的西方政治制度也没有任何相似之处。独立后大部分非洲国家对资本主义制度有一种历史上形成的抵触情绪，而非洲社会主义的实用价值在于它“可以充任官方的政治学说而成为各国追求统一国民文化体系的理论基础，而作为一种制度安排——经济制度与政治制度，它又便于各国领导人以国家的政治权力进行社会动员和社会控制，便于各国领导人运用政府权力进行社会资源的配置。”

最后，几乎所有选择非洲社会主义的国家对外国资本控制的工厂矿山和其他重要的经济部门均实行了所有权的国有化和管理人员的本土化。这对民族经济的建立和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此外，这些国家绝大部分确立了比较激进的经济政策，如经济的非殖民化；政府全面控制国家经济并对经济发展进行各种干预；致力于经济和社会机会的平等化；对私有经济的作用进行适当限制。尽管这些经济政策有的未能全面实施，有的结果并不理想，但这些政策对整合全体公民的国家意识，促进国家经济的一体化和推进民族建构的过程无疑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几乎每个国家的领导人都希望本国的民族问题能得到较圆满的解决，并采取各种措施加速民族建构的进程。然而，他们往往处于一种两难境地。如果领导人无视地方民族的因素而强调国家

李安山：《非洲社会主义的理论特点》，载《科学社会主义》1986年第3期。

唐大盾、徐济明、陈公元主编：前引书，第412页。

同上，第7页。

刘鸿武：《黑非洲文化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294页。

在这方面，津巴布韦是一个特例。津巴布韦独立后在经济上实行了一种渐进的政策，未实行国有化，只实行国家干预。关于津巴布韦的社会主义，参见唐大盾、徐济明、陈公元主编：前引书，第379～409页。

的整体利益,往往会引起各个地方民族(特别是较落后的地方民族)的不满;如果他们一味强调公平竞争,只讲竞争的条件和资格,启用最合格的人选和地区,更会引发落后民族的不满,因为落后民族在殖民统治时期被剥夺了准备的机会。反过来,如果他们对不发达的地方民族采取简单的优惠政策,又会引起其他民族的不满,因为后者往往具备更好的发展条件和在平等条件下竞争资格。在民族建构问题上,坦桑尼亚是一个较典型的例子。

从人文地理结构看,桑给巴尔是完全有可能从坦桑尼亚分离出去的。然而,有的学者认为,在坦桑尼亚,“部落主义不是问题。”何以会出现这种情况呢?这与坦桑尼亚在民族建构方面所取得的成绩是分不开的。我将初步考察坦桑尼亚各种民族政策,同时重点分析乌贾马运动在民族建构中的重大作用。

### 三

坦桑尼亚有三个较为突出的客观条件:统一的语言、尼雷尔的领袖作用和桑给巴尔的特殊人文地理。坦桑尼亚语言繁多,除斯瓦希里语和各种外来语外,尚存在着120多种语言(分属尼罗特语、库希特语和科伊桑语)。坦噶尼喀于1961年独立后的第2年即宣布斯瓦希里语为国语。1964年与坦噶尼喀合并的桑给巴尔的母语也是斯瓦希里语。坦政府采取一系列政策以使斯瓦希里语成为民族一体化的工具。在教育文化部下设有“国家斯瓦希里语委员会”,负责斯瓦希里语的推广、发展和完善;该委员会还负责协调斯瓦希里语科研机构,出版刊物,主办会议。斯瓦希里语成为各民族文化交流与融合的工具,同时也有利于促进坦桑尼亚民族意识的形成,对消除地方民族主义起到了极重要的作用。

坦桑尼亚之所以没有出现民族冲突,尼雷尔的个人因素不可忽略。首先,他来自一个小的族体(其父为扎纳基族的酋长),由他担任坦桑尼亚总统对其他几个大的民族并未构成威胁。他“用人惟能”的政策也可因此避免很多不必要的指责和猜疑。早在20世纪60年代末,坦桑尼亚就有人提出“部落主义”的问题。尼雷尔在庆祝坦桑尼

亚独立9周年的广播讲话中说到:“我已经开始听到关于部落主义的流言;刚独立时我们听到一些抱怨,认为被任命到政府工作的人是以部落为依据的。我们立即委任了一个委员会调查这一传言。委员会毫无疑问地证明在政府职位的任命上不存在部落主义。”有的人对来自一些民族的人担任需要较高文化的职务表示不满,尼雷尔毫无忌讳地回答:“他们是那些在殖民时期受过较高教育的人。”其次,他在民族独立运动中的卓越表现,独立后取得的巨大成就,以及他在国际舞台上的崇高威望,赢得了很高的声誉。他的政治智慧和人格魅力成为每个坦桑尼亚人的骄傲。尼雷尔在执政时期的一系列政策大大促进了坦桑尼亚民族认同感和民族精神的培养。

桑给巴尔地区是一个有自己特点的共同体,确实具有成为一个单独政体的潜力。从自然条件看,岛区有足够的降雨量和肥沃的土地,适合于各种粮食和经济作物生长。从历史上看,桑给巴尔一直享有独特的地位。很早以前,阿位伯和欧洲商人就与这一岛屿进行贸易。1890年,阿曼素丹将此岛置于英国人的保护之下。在反对殖民主义统治的斗争中,桑给巴尔的阿拉伯政治家在传播激进的民族主义思想方面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而这里众多来自非洲各地的劳工又构成了民族主义的良好群众基础。从文化上看,95%以上的桑给巴尔人是穆斯林,从文化上构成了一个相对和谐的社会。坦桑尼亚成立后,尼雷尔并不急于推进民族一体化。直到1977年,坦噶尼喀和桑给巴尔还是使用两部不同的宪法。宪法中明文规定:总统和总理不能同时来自一个地区。根据宪

Esmond Bradley Martin, *Zanzibar: Tradition and Revolution*, London, 1978, p. 133.

我国学者虽然对乌贾马的研究比较多,但对这一点认识不足。刘鸿武注意到这一点,认为“需要一个更深远的历史进程大背景上来加以考察评价”其对国民文化建构的作用。参见刘鸿武:《论当代黑非洲的部族文化整合与国民文化重构——兼论“非洲社会主义”的评价问题》,载《西亚非洲》1997年第3期,第30~31页。

Rodger Yeager, *Tanzania: An African Example*, Westview Press, 1989, p. 35.

参见葛尚:《初析坦桑尼亚的民族过程一体化政策》,载《民族研究》1991年第2期。

Colin Legum & John Drysdale (ed.), *African Contemporary Records: Annual Survey and Documents 1968 - 1969*, London, Reprint 1975 [1969], pp. 216 - 217.

Rodger Yeager. op. cit., pp. 52 - 53.

法第 24(D)(E) 条,总统有权任命最多 32 名桑给巴尔革命委员会的成员和 20 名其他非革命委员会成员的桑给巴尔人为议会成员。在坦桑尼亚 1300 万人口中,桑给巴尔人只有 35 万人,桑给巴尔专区比 17 个专区的任何一个都小,但从 1967 年起,22 名内阁成员中 7 名为桑给巴尔人,在 183 名议会成员中,有 40 名是桑给巴尔人。尼雷尔一直努力使桑给巴尔人深信他们正在从联合共和国中得到好处。坦桑尼亚长时期没有出现民族冲突,桑给巴尔没有提出过分离的要求,与这些政策有很大的关系。

我国学者对乌贾马运动有两种看法。一种认为乌贾马运动强调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地建设本国经济文化,消灭了传统的部落制度,使广大农民长期以来根深蒂固的传统私有观念受到冲击,缓和了非洲国家独立后出现的阶级分化现象,建立了具有一定生产能力的民族工业企业,在向公民提供社会福利方面也取得了很大成绩。有的学者则认为,“‘乌贾马精神’在推进这个国家的现代经济发展方面总的来说是不成功的”。虽然对这两种观点均可找出诸多理由来支持或反驳,但乌贾马运动对民族建构所起的作用是不容忽略的。

首先,促进了民族经济和民族经济意识的形成。作为乌贾马运动政策纲领的《阿鲁沙宣言》可以说是一个坦桑尼亚民族国家的全面发展计划,其内容包括经济、政治和社会三个方面。宣言对坦桑尼亚的经济作了全面规划:建立由国家掌握的经济体系;对城镇的小商业和手工业实行合作化;逐渐消灭外国资本的势力;限制非洲民族资产阶级的的发展。一个由国家制定的经济发展规划在全国范围内实施,这对于在一个以家庭和村社为经济单位的社会消灭传统的自给自足的小生产经济、建立一个较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是至关重要的。尽管在农村有公田和私田两种,而且私田在农民生活中占有更为重要的作用,但乌贾马村的建立是一种政府干预的行为(在 1984 年的统计有 9230 个村庄)。各级政府对乌贾马村的建立和发展(从低级村向高级村发展)的关注,以村庄为单位从国家贷款以购买农具,村民根据计划指标种植农作物,这一切表明乌贾马运动对民族经济意识的形成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其次,在政治上有助于消除地方民族意识。

“乌贾马”的原意是指非洲社会中集体劳动、共同生活的家族关系。“家族主义是我们非洲人所需要的社会主义”,社会将照顾到每一个人,“只要他乐意工作,就不必为明天发愁,也不必去积累钱财……这是过去的非洲社会主义,也是今天的社会主义。”乌贾马运动的目的是在非洲传统村社制度中加入新的内容,实行经济平等和政治民主,改变农村的贫困面貌,从而大大促进社会发展。虽然乌贾马运动的基本单位是村社,但它已大大超越了村社的范围。这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尼雷尔反复强调,他所谓的“家庭(或家族)”,是扩大了“家庭(或家族)”,它可以超越“部落”、“共同体”、“民族”甚至非洲大陆;第二,运动的规模、范围、动员和组织,都是在全国范围内展开。通过广泛的宣传和讨论以及在各级领导中层层传达和落实,乌贾马成为一个民众广泛投入的运动。一个乡政府主席说:“我们乡有 9 个乌贾马村,查尼卡是搞得最好的一个,现在它是省里挂号的模范村。”当这位乡主席考虑如何增加乌贾马村时,他并不是以自己所属的氏族、部落或地方民族为参照系,而是在以坦桑尼亚全国范围内其他的省作为自己的参照系。

再次,从文化层面上激发了坦桑尼亚人民对自身文化的热爱。奴隶贸易使非洲人的心理受到严重摧残,殖民主义几乎将非洲文化贬低到一无是处的地步。非洲的重新崛起必须首先对自己的传统重新认识。乌贾马运动力图将非洲传统的平等和民主的成份利用起来,在坦桑尼亚实行非洲人理解的社会主义。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对非

See “The Interim Constitution of Tanzania”, in William Tordoff (ed.), *Government and Politics in Tanzania*, East African Publishing House, 1967, pp. 214, 205 - 235.

威廉·埃杰特·史密斯:《尼雷尔》,中译本,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5 年,第 205 页;还可参见葛尚:前引文。

南文渊:《坦桑尼亚乌贾马社会的理论与实践》,载《西亚非洲》1987 年第 1 期;张士智、蔡临祥:《坦桑尼亚的“乌贾马运动”》,载《西亚非洲》1981 年第 5 期。

刘鸿武:前引文,第 30 ~ 31 页。

“The Arusha Declaration”, in Julius K. Nyerere, *Ujamaa - Essays on Socialis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8, pp. 13 - 37. 此宣言于 1967 年 2 月 5 日用斯瓦希里语正式发表。

李长兴:《坦桑尼亚乌贾马村纪实》,载《西亚非洲》1987 年第 3 期。

Nyerere, “Ujamaa - The Basis of African Socialism”, in Nyerere, *op. cit.*, pp. 3 - 4.

转引自李长兴:前引文,第 62 页。

洲传统价值观的重新肯定。尼雷尔在《乌贾马——非洲社会主义的基础》中表示:“我们非洲人既不再需要被说服去‘皈依’社会主义,也不需要别人‘教’我们民主。这两者都起源于我们的过去,起源于我们的传统社会。”他还一再指出,坦桑尼亚人民的首要任务就是重新启发自己,重新发现自己的基本价值观念,并强调建设非洲社会主义可以也完全应该从传统的遗产中吸取营养。这种重新认识非洲文化价值观的思想对加强坦桑尼亚民族自豪感起着重要的作用。

最后,促进了民族意识的形成。乌贾马进一步加强了民族一体化的进程。乌贾马运动的基本原则是:没有剥削现象;基本的生产资料为全体成员所有;人人必须参加劳动,按劳分配;每个成员的权利是平等的,成员之间发扬民主互助的精神。乌贾马村的“村管理委员会”由村民选举产生,但主席和书记由坦盟任命。国家对乌贾马村的资助包括兴建学校、医疗站、俱乐部和商店等社会福利设施。一位在乌贾马村教书的青年教师说:“我们实行小学义务教育,学生不缴任何学杂费,教师从国家领取工资,校舍也是政府资助建的,……”一位从省医学院毕业的医生谈到自己在乌贾马村的工作时说:“我是惟一的医生,已来这里8年,另有4名助产士、2名护士和1名看护,负责全村的医疗卫生工作。……近几年来药物缺乏,现在已大为缓解,因为从7月起我们成为卫生部实行‘常用药物计划’的试验点,县里从优分配常用药物。”人民对自己的国家有了切身感受,对政府在自己日常生活中所起的作用十分清楚。这对民族意识的形成、民族精神的培养和民族文化的熏陶是显而易见的。

乌贾马运动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强调自力更生的精神。这种“自力更生”并非以个体或以村社为单位的自力更生,而是在坦盟领导下全国公民立足于本国资源基础上的自力更生。即使在最超脱的文化教育界,这种精神也十分明确。尼雷尔曾指出,发展中国家的大学必须将其工作重点放在对它所在国最为迫切的科目上。它必须致力于那个国家的人民和他们的人道主义目标上。当时,坦桑尼亚缺乏国家建设的思想和规划,在知识分子中存在着严重的与现实社会和劳动界脱节的现象,同时也缺少有知识的技术人才。达累斯萨拉

姆大学不仅为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提供了各种思想和服务,还培养了一大批专业技术人才。这些知识分子成为民族建构的推动者,在自力更生精神指导下的大学教育也培养了公民的民族意识。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乌贾马运动对坦桑尼亚民族建构过程的贡献功不可没。这一运动从非洲本土的文化传统出发,自上而下调动了坦桑尼亚的民族热情,将全民族各个层次的积极性引导到一场试图创立一个符合坦桑尼亚实际情况的社会制度的运动之中。乌贾马运动涉及到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各个层面,对坦桑尼亚人民的影响是深远的。从国家范围内调动人力资源、财力资源和管理资源,对全国人民的生产活动和社会福利进行统一管理,这种做法无疑加速了坦桑尼亚的民族一体化进程。地方民族主义演变有四种可能性:分离主义、互相争斗、寻求公平待遇和融入国家民族。坦桑尼亚选择的是最后一条道路。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的,通过打破族体界线,坦桑尼亚在进行民族一体化方面的努力是相当成功的。

(责任编辑:艾迪;责任校对:徐拓)

Nyerere, op. cit., p. 12.

关于坦桑尼亚农村发展的基本政策,可参见坦桑政府1967年9月发表的题为《社会主义与农村发展》政策文件。Nyerere, "Socialism and Rural Development", in Nyerere, op. cit., pp. 106 - 144.

转引自李长兴:前引文,第63页。

Nyerere, "The Role of Universities", in Julius K. Nyerere, *Freedom and Socialism*, Nairobi, 1968, pp. 183, 186.

Leslie S. Block, "National Development Policy and Outcomes at the University of Dar es Salaam", *African Studies Review*, 27: 1, pp. 97 - 115.

Joel D. Barkan (ed.), *Beyond Capitalism vs. Socialism in Kenya and Tanzania*, Lynne Rienner, 1994, p. 83.

## **Palestinian - Israeli Security Dilemma and U. S. Middle East Policy**

*Sun Shoupeng*

pp. 4 - 6

Palestine issue is the core of the Middle East peace process. Security dilemma is not only the main problem that besets both Palestine and Israel, but also the root of the continued bloody conflicts between the two sides. Peace with deterrence can only keep a state safe, but not the civilians. Only peace with cooperation

can bring about real peace and get the two sides out of the vicious circle of security dilemma. As a sole superpower, the United States' Middle East policy can determine to some extent the progress of the peace process.

## **Nation - building in African Countries: Theory and Practical Research**

—With Comments on Ujamaa's Role in Tanzania's Nation - building

*Li Anshan*

pp. 7 - 13

Nation - building in African countries experienced a highly explicated and even painful process. However, it is this very process that makes African people come to know that ethnic conflicts will not only affect the development of a country and the living of its people, but also menace social order and democratic

politics. The prosperity of a country needs a united nation, so nation - building becomes an important task for many African countries. During the course of nation - building, many African political leaders chose socialism as official ideology, which attributed much to the national integration.

## **Connotation of Mbeki's Idea of African Renaissance**

*Zhong Weiyun*

pp. 14 - 17

After more than 4 years' development and improvement, Mbeki's idea of African Renaissance has become an ideology covering politics, economy, society, cultur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 personal political label for Mbeki himself, and a guide to South

Africa's foreign policies. It advocates liberal democracy and protection of human rights politically, and free market economy and less state intervention economically, so as to enable African economy to merger into the global economy more deeply.

## **A Review of South Africa's Environment History Research**

*Bao Maohong*

pp. 18 - 23

Research on history of environment in South Africa is the result of the development of revisionist history, of infiltration of interrelated disciplines, and of the need of objective realities. Its achievements in the 1990's lie in such research field as exploitation and protection of natural resources, establishment of

national parks, formation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relations between human being and the nature, changes of city environment, natural disasters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etc. Weakness in theoretical bases, racial discrimination and the lack of macro - research prove to be its main problems.